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加快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刘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强调要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并将其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须提高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提高多元化商品和服务供给的适应性、创新力,营造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推进消费基础设施系统化、智能化建设,强化促进居民消费的工作合力。

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十分必要和紧迫

从理论上讲,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消费可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特别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居民消费占据整个内需的主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美国、德国、日本等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平均为55.7%,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万美元时,居民消费占内需的比重平均上升至56.9%。202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2万亿美元,居民消费占内需的比重仅为40%,比201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万亿美元时提高0.5个百分点,但相比于前述主要发达国家仍然偏低。差距就是潜力,加快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

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让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推广应用,让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脱颖而出,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特别是针对文化、养老等居民消费需求旺盛的领域,厘清事业与产业边界,让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各就其位,有利于将14亿多人口所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充分激发出来,推动构建“放得活”“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要求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循环流转。还要看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外需受到国际上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只有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发挥消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作用,促进各类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并增强我国消费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才能以自身的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塑造参与国际循环的新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这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高层次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人均消费同比增长5.6%,其中,人均服务消费同比增长7.6%,服务消费占全部消费的比重为47%,比2023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特别是扩大发展型消费和服务型消费,有利于提升消费层次,更好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迫切需要。2024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仍面临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的困难。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9.9%,明显低于2023年同期的水平,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6.3%,比2023年同期小幅回落。只有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切实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才能更好地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多措并举加快构建以居民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格局

适应居民消费需求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综合采取有力、有效、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居民消费在内需中的占比,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其占内需的比重,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居民收入。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过去五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4%,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6%。这就需要首先促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强化就业优先导向,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改善就业结构,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发挥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作用,完善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加强灵活就业等非标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权益保护。健全职工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完善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增长。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还要看到,过去五年,我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5.7%,增速比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0.6个百分点。这就需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支持长期资金入市,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的长效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约束机制,健全投资者保护机制。丰富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基金产品,规范商业银行收费行为。

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教育、医疗、养老、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明显的消费挤出效应,既能够降低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还能够减轻居民支出压力,起到增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能力的促进作用。为此,要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多元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发挥各类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此外,考虑到旅游、文体娱乐等服务消费还受闲暇时间的约束,要更大力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将带薪休假制度落实情况作为劳动监察和职工权益保障的重要内容。在保证开齐开足国家课程、完成好正常教育教学任务的前提下,制定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的办法,引导职工家庭在适宜出行季节带薪休假。

增强多元化商品和服务供给的适应性、创新力。培育和壮大各类消费供给主体,消除所有制歧视,实行包容、审慎、有效的准入制度,取消文化、体育、医疗、教育等领域不合理的歧视性准入条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打破地域分割和市场分割。促进汽车、家电和电子产品消费等更新换代,增强消费体验。大力发展“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业态,鼓励企业在产品设计、时尚体验等方面融入国潮元素。在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城市,支持开展各类特色消费节庆活动,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积极发展免税零售业态,丰富免税品种和品牌。推进消费品和服务质量、标准、品牌建设。支持企业瞄准先进标杆,实施技术改造和流程再造,补足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质量短板,增强企业的质量竞争动力,推广优质服务管理制度,鼓励应用创新券、培训券等方式,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提升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进一步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加强新兴领域的标准化建设,更好引导服务创新。完善品牌保护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以品牌为基础的质押贷款等。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支持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开放平台,加大关键性政策创新试验力度。

营造便利、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协作机制,畅通消费者诉求渠道,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作用,针对预付式消费、银发消费、网络购物等重点领域,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通过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和各类媒体,加强消费维权知识的普及和提供维权咨询。强化消费者权益损害法律责任,扩大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服务范围。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适当扩大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探索建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完善诉讼、仲裁与调解对接机制。加大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力度,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信息采集、整合和共享,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完善多方参与的社会共治,加强与平台企业的合作和对接,提升监管效能。构建以企业服务质量为导向的动态监管机制,在坚持包容审慎原则和坚守安全质量底线的基础上,根据消费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需要,完善必要的准入条件,降低供求双方质量信息的不对称。

推进消费基础设施系统化、智能化建设。以消费升级需求为导向,建立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投资模式,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体、旅游、健康、养老、教育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推进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下游市场应用,融合部署市政、交通、能源等设施建设和改造。以都市圈为基本单位,顺应人口流动和空间演变趋势,统筹安排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进中西部、农村地区现代流通、信息网络、服务消费等短板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于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用途拓展到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等消费新场景。

强化促进居民消费的工作合力。促进居民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除商务部门之外,还涉及多个政府部门,要密切协作联动,整合政策资源,发挥政策合力,完善涵盖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消费领域统计指标体系,更加全面反映居民消费发展情况。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提高地方促进居民消费的工作积极性。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王蕾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关乎经济发展,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不仅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注重目标引领,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需要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摆在更突出位置。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形式、需求不断变化,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提高就业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实现就业工作的质效双升,需要多措并举,形成政策合力,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动力。

一、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就业创造能力

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根基在于高质量发展,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要提升就业创造能力,必须注重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

首先,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通过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升级,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伴随新技术的出现,产业转型升级会涌现新的岗位、职业等。例如,加快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不仅能提升生产效率,还能创造诸如数字化运维工程师等新兴职业。传统产业的创新升级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就业岗位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其次,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绿色低碳等重点产业,加速布局新赛道,形成更多就业增长点。特别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充分激发其吸纳就业的潜力。同时,新兴产业的发展应注重与区域特色结合,从而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最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就业资源合理配置。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力度,引导产业向劳动力富集地区转移,充分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解决部分地区就业压力过大的问题。与此同时,应充分发挥城乡协同作用,推动城乡就业联动发展。通过支持乡村特色产业、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创造更多乡村就业机会,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二、强化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

在推动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中,解决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问题是关键。高质量就业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技能水平和适应能力,因此必须加快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首先,深化产教融合,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整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更多契合行业需求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特别是针对当前一些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出现的技术工人缺口,要加大精准培养力度。现代职业技能培训还需充分考虑不同年龄层次和职业背景的需求,以实现多层次、多维度的技能提升。其次,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为劳动者赋能。通过政府补贴、企

业支持和个人参与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针对不同群体的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例如,为农民工提供城市化相关职业培训,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新兴技术的快速入门课程。特别是在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过程中,注重提供前瞻性培训课程,帮助劳动者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再次,建立供需对接平台,实现人岗精准匹配。通过大数据技术分析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状况,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搭建高效对接的桥梁,促进就业质量和效率的双提升。同时,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标准化建设,制定统一的技能认证体系,提高劳动者技能的市场认可度。加大对职业培训师力量的投入,创新培训形式,如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让更多劳动者能够方便快捷地接受培训。此外,还需关注职业技能培训的实践环节。通过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建设等方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劳动者的职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三、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筑牢民生底线

实现高质量就业,必须关注重点群体,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以多样化的政策工具确保就业公平,守住民生底线。

首先,聚焦青年就业,拓宽职业发展空间。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开发更多适合其专业优势的岗位,鼓励其到国家重大工程、重要领域就业。同时,加强职业规划和心理辅导,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积极应对职场挑战。其次,稳步推进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支持。通过产业导入、园区建设等方式扩大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引导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同时,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提升其职业保障水平,防止因就业问题返贫。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本地二三产业转移就业,完善农村创业扶持政策,培育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乡村创业项目。再次,加大对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力度。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提供就业补贴等措施,帮助大龄劳动者、长期失业者、残疾人等群体实现再就业。特别是针对零就业家庭,建立动态清零机制。在构建支持体系的过程中,还应注重重点群体的心理建设,帮助他们应对就业转型的心理压力。结合区域性就业信息共享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此外,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动员各类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为就业困难人员提供更加精准的就就业帮扶和心理支持,进一步增强其就业信心。最后,推动建立区域性就业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区域间产业协同优势,进一步拓宽重点群体的就业渠道,形成多方联动的就业保障网络。

高质量充分就业关乎人民幸福、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切实提高就业质量,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要把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协同各方力量,形成政策合力,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辛勤努力中实现自身价值,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商业大学基地研究员)

加快培育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

王坤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作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关键是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降碳模式由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和形成绿色低碳发展动能转变。当前,我市正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先行城市,围绕绿色生产力科学布局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全面建设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将有助于形成减排降碳协同增效、经济社会生态耦合发展的新增长格局。

一、打造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绿色富农产业链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农业在减排降碳、绿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大力发展以生态农业为基础的绿色富农产业链,实现乡村绿色产业振兴与绿色富农有机统一。一是打造农业绿色品牌产业链。以“小站稻振兴计划”为引领,促进沙窝萝卜、茶淀玫瑰香葡萄等一批传统绿色农业品牌复兴,形成生态地理标志与生态产品标志双重支撑的农业品牌效应,完善以农业品牌为依托的农产品生产经营体系。二是做强种业科技创新产业链。立足种业研发优势,加快种业科技创新产业化,大力开展种业自主创新与科技攻关,推进前端种业科技研发产业、中端育种培秧产业、末端种子销售产业链式发展,做强做优做大“津种”产业链。三是延长农产品价值增值链。以农业生产环节为起点,推进农业生产向下游延伸,推进农业生产服务化、农业服务产业化,打造三次产业有机融合的价值增值链。

二、打造以生态工程为依托的绿色碳汇产业链

推动生态工程降碳功能与价值创造功能协同发挥,加快构建以湿地、森林、海洋等碳汇资源为载体,以城市碳汇账户为支撑、以区域碳汇交易市场为平台的绿色碳汇产业链,形成碳汇资源开发、碳汇产品开发、碳汇交易服务等多业态集聚发展优势,打造“大生态+大产业”绿色低碳发展新模式。一是以自然资源产权改革为基础完善碳汇产品生产体系。积极探索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改革新路径,创新以自然资源公有制为基础的特许经营、合作开发、公私合营等自然资源权益经营新制度新模式,明确碳汇资源经营主体,激活碳汇产品供给端活力。二是积极争取国家碳汇交易市场试点建设。探索以“碳普惠”为依托的个人、小微企业碳汇交易,打造专业化碳汇交易平台,率先抢占全国碳汇交易专业市场。三是发展碳汇交易服务产业。鼓励碳汇资源测算与价值评估、标准化碳汇产品研发、碳汇金融、交易信息对接等专业化碳汇交易服务产业发展,形成以碳汇交易为核心的大碳汇产业体系。

三、打造以数字经济为驱动的绿色智能制造产业链

推动绿色低碳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强化“制造业立市”战略绿色低碳导向,强化绿色智能制造上游技术研发、下游产品消费、物流和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完善绿色智能制造产业链。一是形成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生态链。以绿色低碳循环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驱动,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推动制造业降碳环节智能化提升、产业化发展,加快形成制造业循环生态链。二是加快培育绿色智能制造新产业。大力发展智能排放控制设备、碳循环利用设备制造业,立足制造优势迅速抢占绿色低碳智能设备市场,打造绿色低碳智能制造基地。三是推进优势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加快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集成电路、车联网、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优势产业链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建设,提升优势产业链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强化产业链式效应,引导生产体系全面绿色转型。

四、打造以碳金融为标志的绿色金融产业链

结合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大力开展碳金融产品、服务和业态创新,形成碳金融产品集聚优势,健全包括绿色信贷、绿色消费金融等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一是积极培育碳金融服务业。鼓励围绕碳排放权交易、碳汇交易的碳金融产品创新,碳交易融资服务等碳金融行业发展,形成支撑碳排放权交易、碳汇交易的碳金融服务业体系。二是积极建设全国性绿色金融服务平台。依托全国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积极探索标准化绿色金融债券交易、绿色金融产品非标交易等绿色再融业务,推动产业集聚,建设全国性绿色金融中心。三是拓展绿色金融服务链。鼓励培育绿色物流金融、绿色消费金融等新业态,完善覆盖生产、生活、流通的绿色金融服务产业链。

五、打造以循环技术为支撑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落户天津为契机,以专业化循环产业园区为载体,推动循环产业技术升级、产品升级、业态升级,形成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链网,打造全国绿色低碳循环产业集聚高地。一是加快打造循环技术创新产业链。加快循环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引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构建覆盖基础创新、应用实验、产品生产销售各环节的循环技术创新链。二是高质量建设废弃物综合利用产业链。串联新能源、新材料、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优势产业,提升上游回收、拆解产业技术标准和技术水平,强化中游研发与再生产产业创新,打通与下游节能建材、再制造等产业对接,打造升级版“城市矿山”产业链。三是着力打造工业碳循环产业链。依托完备工业体系,加快工业生产环节碳循环利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推进工业二氧化碳产业化循环利用,构建企业碳循环、行业碳循环、园区碳循环融合互补的多形态工业碳循环产业链。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